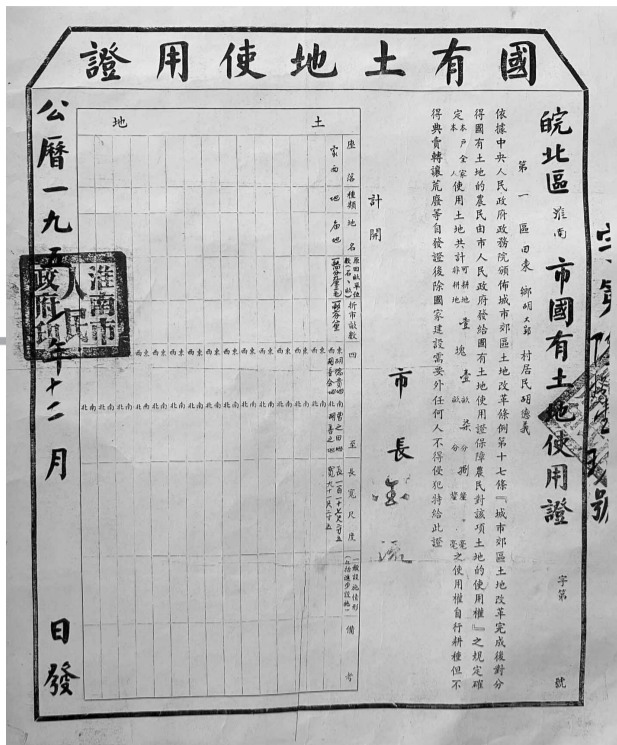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 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

——追忆淮南市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熊文田



家出劳力，缺农具、牲畜，就从别的组员家调剂使用。互助组还想方设法为组员排忧解难，在各方面关心照顾被抽调的民工家庭，让组员切身体会到互助组的温暖。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互助组与独户单干的家庭相比较，显示了许多方面的长处，博得组外其他农户的羡慕和认同。胡保英互助组共56人，其中男36人(整劳力15人)、女20人(整劳力11人)，拥有土地237亩，每家每户的农具、牲畜等，都以折价的形式入了股。土地按每亩平均4元(折合旧币4万元)结算，全组拥有耕牛5头，驴、马各一匹，犁7张(其中两张新式步犁)，耙两张、大车两辆，粉磨一盘，缸7口，大小猪13头以及各种必备的小农工具。

誉称号，胡保英被评为安徽省农业劳动模范、华东治淮模范、淮南市头等治淮模范，胡林慰被评为区冬学模范。胡保英互助组也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淮南市头等模范互助组”称号，胡保英代表互助组到市里参加表彰大会，受到当时市领导李任之等的接见。市里奖励互助组一条耕牛。村里比过年还热闹。这次的表彰，为淮南市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拉开了序幕。

## 四、社员们真正地吃饱了饭

在胡保英互助组的示范带动下，1951年全市先后组织起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444个，到1952年便发展到998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41.6%。

然而互助组虽然解决了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着一些不足之处。在互助组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当农民个体无力独立生产时就互助互助，而可以独立生产时便涣散解体，互助组内部常因田间作业顺序的先后而发生争执，如：喂牛户先耕自己的地，无牛户不满意；锄地时大家都争着叫先锄自己家的，给谁锄得晚，谁有意见，夏秋收割，都愿意迟收割让庄稼长得成熟些，但熟了以后，又都愿意快收，怕刮风下雨。在互助组的运行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些影响生产、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不仅在胡大郢子村，在全市、甚至全国都会出现。

所以，这次方茂初、杨冠全到胡大郢子村送的不仅仅是一头耕牛，送来的远比耕牛更宝贵的，是思想——解决时下农业生产关系和难题的思想。

方茂初、杨冠全和胡保英、胡保英在村里不断讨论、研究，最终，“土地入股统经营”的发展思路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每个农户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一个组织，耕地和农具也作价入股，由社里统一分配和使用，土地按股分红，劳力按工分分红。这个组织就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站在现在反观历史，我们才能总结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所有制。就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1952年的淮南农村，由胡保英带领着一群农民，悄然铺陈开来。

(未完待续)

(上接1月4日A2版)

## 三、解决两个难题

有了土地，大家有了希望，有了奔头，也有了干劲。但是也遇到了难题：没有文化不懂得种田知识，没有生产资料，不是这家没有牛，就是那家没有犁。作为领头人的胡保英首先要解决这两大难题。

“办夜校！”当胡保英把自己的困惑向上级汇报时，时任一区区区长陈继兰，给他出了主意。说干就干，回到村里后，胡保英就动员村民办起了夜校。村民胡保楼腾出自己家的三间房屋作为教室，胡保英请来了村里当时最有文化的胡善英当教员，向学员讲授些政治常识和革命道理，进行文化扫盲教育。就这样，这所因陋就简的夜校，成为了胡大郢子村加强村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推广新的种田知识的阵地。据胡耀昌回忆，来夜校听课的人多的时候有50多人。

胡保英也是在夜校学习中，思路越来越开阔，解决问题的办法越来越多。有一定文化知识基础的胡保英被组织派到固镇县参加农业机械知识培训班。就是这一次学习，改变了胡大郢子农民的命运，改变了淮南农业的生产方式。

关于这个互助组的一些情况，在刘曙光同志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文中，还原了一些史实：

1951年初，当时已经是胡大郢村村长的胡保英到固镇县参加由皖北行政公署组织的农业机械知识培训班学习归来，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他找到解决第二个难题的途径，他认为有必要对农村延续了多少代的耕作方法进行革新，推广新式耕作方法，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农民应当走组织起来的路子，互帮互助。胡保英和其胞兄胡保英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根据自愿原则，将部分农户组织起来，成

立互助组织。

这样，由胡保英、胡保英、胡德举、胡林慰、胡兴昌、胡效昌、胡保楼7户农民组织起来的“胡保英互助组”于1951年4月成立，大家推举胡保英担任组长，全组共30多人。这种劳动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生产资料仍归各自所有。互助组一成立便向国家申请贷款购买了一头耕牛，以加强耕作力量。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解放后分得土地的农民对互助合作顾虑重重，思想情况非常复杂。胡保英在开会时反复说明组织互助组的好处时，全村只有3人赞成，大多数人直摇头。怎样解除农民的顾虑，打通思想，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参加互助组，是胡保英在基层农村组织互助合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和胡保英在宣传发动方面费了不少心思。他们从新旧生活对比、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最头疼的家庭矛盾等问题入手，对村民反复劝说组织起来的好处。好学的胡保英就向村民宣传他学来的“七想”：“一想黄水滔天，二想逃荒要饭，三想有田难种，四想少吃没穿，五想地主万恶，六想妻离子散，七想过夫妇女关在阎王殿，现在打断了铁锁链。”让大家对比过去的苦难，珍惜如今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这种忆苦教育很奏效，到1951年7月份午季结束，又有8户农民申请加入了互助组。这样，到下半年，胡保英互助组就由最初的7户发展到15户，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由7户增加到15户。

1951年4月，农民开始春耕春种。根据当时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和调度，该村一部分青壮年农民参加淮河大堤的治理修防工程，互助组中有5个劳动力被抽调去，出现了有的家庭干农活人手不够或缺少农具、牲畜等情况，后经全组讨论，改用简单的换工互助形式，即每户缺什么大家帮什么，如缺劳力，大